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朱德发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朱德发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朱德发 著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2092663 传真：(0531)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规 格：850mm×1168mm 32 开本

印 张：12.25 印张

字 数：289 千字

书 号：ISBN 7-5328-3815-3

定 价：1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朱德发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28-3815-3

I. 世... II. 朱...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731 号

绪言 世界化与中国文学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信息的一种载体和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一种审美形态，从其历史演变来看则是经历了一个由非自觉到自觉的逐步世界化的过程，中国文学的变迁概莫能外。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球各民族文学之所以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或不同的方式最终步入世界化的总趋势和总格局，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普遍联系乃宇宙之通则，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人类又是有思想有意识的族类，必然具有趋向世界化的天然基础；况且人类的生理构造和生命欲求即各种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并没有质的差异，即使在精神文化层次或审美艺术层次的追求上也有惊人的趋同性，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几乎是世界各族文学的共同母题；尤其人类思维的进化经过了混沌型、主客体分殊型、理性与非理性型、辩证系统型等几个阶段，尽管对人类每个阶段的思维成果在表述或传达上所运用的媒体形式或语言符号并不相同，但各族人群在对自我、对他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的体验和认知上依然有相通相似之处，如果以不同的审美形式对此予以表现或再现，那么所凝成的千姿百态的审美文化或文学文本不只是属于各个民族的也属于世界范畴的。“假如超越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超越‘中’‘西’派系观念而站在它们之上，我们也许会看到不同的甚至差别极大的两种文化由隔膜、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或者觉察出两种文化在碰撞中，会产生文化的新因子甚至产

生某种新文化的信息。”^①

综观人类各族文化、文学的世界化趋向，早已成为历史叙事。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呈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碰撞交流融汇的开放活跃的多元态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独尊儒术”并没有切断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多向联系，张骞通西域开始了主权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与异民族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的开通、魏晋南北朝各民族文化的大冲突大融合、唐玄奘西天取经、元帝国开疆扩土、郑和航海下西洋、利玛窦传教来中国等，凡此诸种举措都推动了中国文化、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汇、融通和契合，使中国文化、文学逐步面向世界。如果明代以前对中国文化、文学与世界化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仍处在一种非自觉状态，就是西方各民族的先贤们在19世纪前也没有对民族文化、文学与世界文化、文学的关系作出精到而深刻的理论概括；那么对此真正有了明确的理论透析与理性自觉应始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那些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敏锐地发现了文化、文学发展的世界化趋向，及时地升华到现代理性高度进行阐释。中国明代传奇《风月好逑传》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经典之作，可是传到德国，1827年1月31日歌德读后，就对其秘书爱克曼发表了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查理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他还发现，“世界永远是一样的，一些情境经常

^① 杜书瀛：《在全球化浪潮面前》，2001年《文艺争鸣》第6期。

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那末某个诗人做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境可能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① 歌德不仅从人类本身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上感悟到德国人与中国人是“同类人”，认识到中国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与他的小说、英国查理生的小说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从现代文化语境和诗人生存环境中发现了各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并站在全人类立场上首先发出“世界文学”的呼唤。如果说歌德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或文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和论述了“世界文学”这一命题，那么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深刻洞察了全球各民族之间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所发生的巨变而带来的世界文化、文学的新趋向，故而作出了这样的精辟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家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

① 《歌德谈话录》，第 112—11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

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有力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世界化必然带来了文学艺术、精神文化的世界化，文学世界化趋势和格局的形成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这就把全球各民族文学殊途同归的世界化趋向提到了高度的理性自觉和规律性的认识水平，从此文化、文学的世界化的自觉时代真正开始了。

文学世界化自觉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文学现代化自觉时代的开始，也意味着世界各民族文化、文学广泛交汇的自觉时代的开始。然而由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转换出现了滞后的时空差，所以不能不影响到中国文化、文学跨入现代化路径的速度，不能不影响到与那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文学发展取得同一的步调，致使文学的演化也没有进入理性自觉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也决不能忽略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雏形和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启蒙文化思潮，这成了古代文化、文学向现代转化的最初源头。明清之际，古代中国文化、文学在没有取得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文学进行广泛而自觉的交流汇融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内发式”地向现代文化、文学形态演变，考其原因主要有：一是世界各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总会冒出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或回答问题的思路及其获得的认识和结论也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在 15、16 世纪中西启蒙者都重视方法论的变革和新工具的铸造，培根曾取自然科学的经验归纳法，笛卡尔则赋予演绎法以现代理性精神，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现代科学方法论；而在中国的 1561 至 1581 年间，朱载堉则提倡数理演绎法，徐光启于 1607 年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理》强调以科学理性精神来变革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梅文鼎、王锡阐、焦循等都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5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不同程度上变革了认知方法，力求从封建理学的蒙昧中解放出来。二是与西方相似，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也有自己的内发的最早的人的发现运动，蕴含一种如古希腊罗马文化相似的原创人文精神，而这种原创人文精神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中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尤其值得探究的是，人文精神生发于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冲突，中华民族求生存图发展的内在生命欲求生生不息，它总是同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处于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态，如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能够程度不同地满足中华民族个体人或群体人的生存需要和生命欲求，那么它的文化载体和艺术文本就会储存一种内生的带有乐感色彩的人文精神，否则就会蕴含一种悲感性的人文精神。对于明清之际在文化文学中出现的带有现代性的人文理性精神，中外学者都有不约而同的深刻见解。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论及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言志”文学主张，他认为和“五四”文学革命“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① 晚明“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② 尽管我不能完全认同周作人的观点，但是他发现“五四”文学理论主张与文学文本同晚明在人文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却是独具慧眼的。李泽厚从哲学的角度把宋明理学与康德伦理学作了比较，他发现：“由于宋明理学细密的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识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3页，北平人文出版社，1932年。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52页，北平人文出版社，1932年。

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在世界思想史上，大概只有康德的伦理学能与之匹敌或相仿。康德著名的墓碑：‘位于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与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表现人类主体伦理本体的崇高上，是同样伟大的。”^① 美国学者史景迁对“中西文化类同”现象作了探究，考察 16 世纪 80 年代“这个时期分别在欧洲和中国（万历二十年前后）产生的著作，你们就会发现这些非同凡响的杰作：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汤显祖的《牡丹亭》、艾德蒙·斯宾塞的《仙后》和吴承恩的《西游记》的作者是怎样描写善与恶的冲突的，看一下他们的叙事方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类同。奈什与《金瓶梅》作者出于各自的原因则将性欲的力量与政治的野心和金钱结合起来，这真是惊人的类同。”“这种类同是否也与社会的一定类型的经济发展有关？显而易见，明代的中国社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社会都是处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城市的、或许是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其文化当然会有长足的新发展，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导致类同。”^② 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同可以论证文学主题及其叙事方式的类同性，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发现更是从人性深度上揭示出不同民族、不同集团、不同个体之间可以达到相互沟通相互趋同的心理基础。他认为，在“个人无意识”的深层先天所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人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

① 《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 146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②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 23—2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我们每个人身上”^①。这为我们深入探察明末文化、文学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化、文学有相似之处提供了心理根据。

既然古代中国文化、文学到了明末清初具有向现代化转型的契机，那为何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像西欧文学那样通过“内发式”途径完成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固然主客观原因很多，但由于中国社会进入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而未自觉地跨进世界化的大文化环境，使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许是重要的原因。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国科技文化的强大势能才冲垮中国缓慢渐进的传统文化体系，随后维新变法的异域先进制度文化和甲午之战的外族先进军事文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使古代中国社会向现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转型，从此“现代中国文学”也以自觉的主动的历史姿态进入世界化文化语境和世界化文学格局，加快了中国文学向现代化文学转变的步伐。正如梁启超彼时写的《过渡时代论》所指出的：“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縟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②如果说梁启超所论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时代，不仅这个过渡时代的各种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而且中国步入现代化的时代也应该从晚清算起。恩格斯曾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

① 荣格：《心理与文学》，第52—53页，三联书店，1987年。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5页，三联出版社，1978年。

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①。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有了较大发展，以康梁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变法维新派则通过学会、学校、报刊等机构把知识分子组织引入政治运动之中，使其思想接受西方意识，又通过这些机构或工具使知识分子政治化，“他们的宣传组织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意愿，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作了准备”^②。所谓政治的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渴望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政府，正在制定和贯彻加快社会制度和经济改革的政策，要求他的全体国民同心协力实现这种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构成障碍和危险的不是具有改革倾向的现代人，而恰恰是那些固守传统、对社会改革采取敌视和抗拒态度的人”^③。由康梁为代表的革新派所推行的维新变法虽然在顽固守旧派的镇压下遭到失败，但是一场维新运动却将中国推上了现代化道路。晚清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向着现代化转型，这已被历史实践和思想逻辑所证明，与此相伴随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白话运动等文学的全面改革，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河。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现代中国”应以甲午之战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作为起点，中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这都是中国社会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9卷，第288页、297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6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美]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人的现代化》，第6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步实现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也是“现代中国”日趋进步、日臻完善的演变过程。“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代国家观念的基础之上，它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要从文学本体的现代性来立论的，即使它与外在社会形态相联系也仅仅限于新民主主义，缺乏一个宏大的时空交叉的现代国家观念和社会背景作为支撑。因此以现代多民族多区域的主权国家概念来规范现代中国文学，凡是现代中国历史生成的文学现象、文学形态以及倡导的文学变革运动和创造各种体式文本的作家等，都应该纳入“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完成式与进行式相结合的历史范畴。在“现代中国文学”全景式的框架里，不论“新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无不是在世界化语境下形成的，即使那种“旧瓶装新酒”的传统体式文学也不能不受到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沾染，特别是现代中国文学所经受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思潮的冲击和洗礼更离不开世界化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自觉的世界化意识就不可能建构面向全球面向现代化的各种样态的现代中国文学，所以现代中国文学的成功或失败、可取之经验或应记之教训都必须从世界化与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中去探询。试想百年文学创建过程中，那些杰出的作家谁不是在世界化语境中博览群书、吸纳众长、杂糅百家、学贯中西，以整合各家的艺术视野营造独特文体来表述自己人生的多重体验和多方面的人生追求？并显示出中国作家的心扉向世界洞开，似乎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文学思潮都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找到自己的实验地。鲁迅对于尼采、克尔凯格尔、卢梭、易卜生“任个性”的赞同，对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精神界之战士”的认可，郁达夫对卢梭、屠格涅夫、劳伦斯、佐藤春夫等创作风格的推崇，巴金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赫尔岑、屠格涅夫、雨果、左拉、卢梭、罗曼·罗兰等思想创作的崇尚，王蒙对苏俄作家的倾心、对美国

作家海明威和约翰·契弗的称道，苏童对塞林格、福克纳的向往等等，不一而足。这都说明现代中国作家是以天马行空、综合包容的思维与胸怀接纳域外不同风格作家的，或汲取思想营养或借鉴艺术技巧，以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心理学认为：“一个具有许多渗透性建构的人比一个具有大量非渗透性建构的人更有可能扩充他或她的建构系统。”“一个人的建构系统是处在持续不断的消长变化的状态中，不同的建构群在不断地经受验证，而各种新元素也不断被补充进个人的那些更具渗透性的建构之中。”^① 现代中国不少文学大家正是具有这种开放的变动的文化人格，在广泛接触域外文化、文学中得到不断充实和补充，才创造出无愧于与世界化潮流相呼应的文学精品。百年现代中国文学史证明：“20世纪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富有世界主义的性质。”^② 虽然中国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世界发达国家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甚至某些文化思潮异质相对，但是经过殖民与反殖民、征服与反征服、西化与反西化、同化与反同化等激烈冲突与搏击后，终于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建构起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新型中国文学系统。

现代中国文学从晚清自觉地进入“世界文学”轨道，尽管与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学相比存有滞后差，但这并未影响现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应有的地位。这是因为文学的世界化并非一统化、相同化、雷同化，全球各民族只铸造一种模式一种形态一种风格的文学。也就是说世界化对于各民族文学既不是同化也不是合并，即使那种强势的霸权文化有这种热心最终也实现不了，文化是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生命之根，溶化在民族的肌体里和

① [美] 赫根汉：《人格心理学》，第335页，作家出版社、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法] 马·法·基亚：《比较文学》，第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个人的血液中，积淀于民族集体无意识里又渗透于人的文化人格中。世界化只能为各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更充实的营养源和更丰富的参照系；况且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个性气质、不同审美取向的作家面对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与精神契合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精神层面、审美层面或技艺层面、话语层面的中外作家的对话、交流、融通、汇合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文化心理联系、冲突与沟通，决不是谁吃掉谁谁同化谁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遵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而营造现代型的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学，百年现代中国文学的千姿百态并没有失去传统文化之血脉，即使那些现代性极强的文学样态也没有阉掉民族之魂，只不过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较之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已具有与现代性相适应相和谐的新特质新色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化的自觉轨道，从转型、建构到发展的全过程，现代化与民族化并非总是处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而是相互变奏、辩证统一，试想没有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怎能进入“世界文学”之列，没有文学的民族化中国文学哪有丰富鲜明的民族个性？文化、文学无论在世界化平台上怎样地超越时空、超越国界去融会去契合，一些“永恒的主题”都难以通过“创新”而超越。雅斯贝斯曾谈及人类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印度的佛陀、巴基斯坦的先知们、希腊的荷马、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差不多同时出现，而“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①。尽管至今人类具有永恒的困惑、相似的和相通感悟，然而这种困惑、思考和感悟只是“相似”“相通”却不完全“相同”，这说明

^①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不同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钱穆说过，中西“双方的学术思想界，正如双方自然环境般，一边只见破碎分离，一边只见完整凝一，这是中西的大分别所在”^①。又说，“西方人入世必尚争，中国人入世则尚和。此又中西双方之大不同处”。^② 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世界观则决定着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民族性的存在，也表明文学全球化必然具有多元化的绚丽色彩。

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化转型得益于全球化，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得力于全球化，中国当下文学的发展更离不开全球化。因此，进入 21 世纪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探索，必须严肃认真地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即“全球化”浪潮，既要抓住机遇又要迎接挑战，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其实全球化即“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并非始于当下，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发生结构性变化之时，学人们就已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照生成于中外古今纵横交叉坐标系上的现代中国文学，并且这一宏阔的研究框架在近百年的学术实践中不断得以调整、充实和强化。今天重提“全球化”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承续更有其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其警示意义来说，它提醒我们“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交流、学术对话从来也不是绝对平等的，往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造成一种霸权威压，特别那些先进的文化形态对于滞后的民族文化大有吞并或同化之势；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既要有吐故纳新的博大胸怀又要有坚定的民族文化立场和民族自信力；既不要充当文化上的“假洋鬼子”又不要甘当落后文化的“守家奴”。

① 《中国文化史导论》，第 218—219 页，商务印书馆，1994 年。

②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 12 页，岳麓书社，1986 年。

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它能强化学者“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自觉性，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纳入更加开放的“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使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进一步走向世界，在全球性的文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汇中缩短我国文化艺术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为“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宏大工程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文化资源，为中国文坛涌现出更多的世界级大文学家和大学者创造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有利也有弊，但利大于弊。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必须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其一，以不变应万变。现代中国文学向来是大时代的风雨表，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历史转型的激变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特别参加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运转进入世界一体化，发达国家的强势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不仅将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产生不间断地冲击，而且也将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人们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影响。在这种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的形势下，文学创作首当其冲地成为时代的晴雨表，而现代文学研究或评论也决不能滞后于文学创作，必须扮演先行的角色。然而，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创作形态或理论形态发生了多大变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和学术文化的宗旨和立场都不能变（中国特色并非一成不变，而这个变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其二，坚持差异性严防一统化。在“全球化”语境下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不论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文学运动的微观宏观考察还是对中外文学进行比较研究，都是既有利于开拓学术视野、选择最适当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视角，又有利于发现新思想新意蕴新学理新知识新技艺，也有利于把握不同作家、不同文本、不同流派、不同思潮、以及不同国